

徐志啸 著

近代

中外文学关系

(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叶)

Jindai Zhongwai Wenxue Guanxi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近代中外文学关系

(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叶)

徐志啸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外文学关系/徐志啸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ISBN 7-5617-2188-9

I. 近… II. 徐… III. 近代文学-对比研究-中、外 IV. I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4107 号

近代中外文学关系

作 者 徐志啸

责任编辑 钟明奇

责任校对 邱红穗

封面设计 高山

版式设计 蒋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发行部 电话 021-62571961

传真 021-62860410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32 开

印 张 7.2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0 年 3 月第一次

印 数 2500

标准书号 ISBN 7-5617-2188-9 /I·227

定 价 11.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前 言

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叶这半个世纪左右的历史阶段,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引起重视的一段时期。中国传统文学在走过了二千多年曲折复杂的演变进展历程,跨入这一时期时,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的完成是在“五四”及其后,但毋庸讳言,它的开端无疑在这个阶段,尤其是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叶,即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前后。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由旧时期——封建主义时期,走向新时期——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文化由旧文化——封建文化,走向新文化——“五四”现代新文化,中国文学由传统旧文学走向现代新文学的转型期。自然,明显的转折乃在“五四”前后,但这个阶段却是必不可少的准备时期,或称“前新时期”。

从政治历史角度言,中国社会发生变化的起始年,大致在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但就文化与文学言,这种变化的起始则大约在1860年,其时,同文馆等纷纷创立,开始大批培养翻译人才,大量翻译外国书籍,表明中国文人中的有识人士已认识到了引进西方文化及文学的重要性,由此开始了近代中外文学关系的历史。

近代中外文学关系这个课题,从严格意义上说,文学的成分并不十分纯,其间夹杂了不少文化成分,这是由近代这个历史时代本身特殊条件决定的。因为中国与外国在近代的最初交往,并不肇始于文学,且双方交往的各自目的,也并非为了文学,更多地乃是为了政治或社会,包括军事需要,其中部分掺杂了文化;真正为文学本身考虑,乃是在其后,而在这个阶段,文学更多地则是扮演了

工具或手段的角色,因此,阐述这段历史,既要说清问题本身,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文化与文学相掺杂、难以截然分开的状况。

特别要作说明的是,正因为考虑到上述因素,且这个阶段本身时间跨度不长——仅50年左右,故本书拟突破一般史书的框架,以一种新的模式来代替历来完全按时间先后顺序叙述的传统格局。鉴于此,本书的框架设计分为:引论——介绍、评述整个半世纪内及其前中外文学关系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上编——专题篇,列五个专题展开论述——翻译文学的兴盛、中西文学的比较、中日文学的影响交流、外来文化思潮与世纪初文坛概况,以及西方的中国文学翻译与评论(五个专题虽无严格的时间顺序,然大致上有先后过程);下编——人物篇,择取五位代表性学者予以评述,他们在近代中外文学关系方面着力较多,成就卓著,具体为:林纾、严复、梁启超、王国维、周树人(鲁迅)(按出生年顺序排列);结语——简要概括总结近代50年左右中外文学关系的特点,及其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全书的重点毫无疑问在上、下两编,它们既各自独立,又互为照应,形成纵向与横向交织的有机网络,其中,纵向是史的沿革轨迹,横向是论的专题剖析,而纵横的交织则是代表性学者的评述,由此构成不同于它本书的格局。

自然,中外文学关系的全面展开与深入发展,毫无疑问是在“五四”及其后的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而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这半个世纪,充其量只是酝酿、准备时期,因而呈现于这一时期较多的乃是翻译与粗线条简单比较,谈不上深层次的研究。但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可忽视这一历史阶段,因为它毕竟是中外文学关系的开创期、启蒙期,是整个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史的“史前准备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正由于此,笔者才勉力撰就了这部不成熟的著作,以期填补这一课题至今为止仍存在的“空白”。

引 论

中国历史进入到 19 世纪中叶,开始发生根本的质的变化:延续了近二千年的封建帝国,由于外来炮火的猛烈轰击,渐趋动摇、崩溃;长期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随着外来文化的相继涌入,发生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封建的、闭关锁国的大一统帝国,到此时被轰开了大门,外来的“西洋之风”开始吹进来了,这导致中国人不得不睁开眼睛看世界,知晓原来中国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还有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在风格与内涵上不相合一的外国文化(虽然此前早有外来文化输入中国,但感受远不如此时典型、强烈)。

1840 年的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耻辱,带来了灾难,伴随着一系列丧权辱国事件的接踵而至,中国老百姓开始受到了封建和殖民的双重压迫与剥削,中国历史从此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但是,鸦片战争本身,同时也导致了中国社会从内部开始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一批有识之士,从洋枪洋炮声中看到了中国的痼疾,看到了中国的危机,他们奋而振起,欲拯救国民,欲使中华强盛,使之从此不再屈服于洋枪洋炮,由此,变革图强成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相当一批爱国志士的口号行动。自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叶这半个世纪左右的历史中,中国的舞台上始终不断地演绎着图变的活剧。

从文化角度言,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叶的半个世纪中,最大的变化,是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撞,以及由这种冲撞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包括交融、排斥,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嬗变;

文学自然紧伴随文化,两者或合为一体,或有所分异——这种变化的过程,自然而然形成了我们所要阐述的中外文化与文学的关系。

为着更全面、深入地了解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叶之间中外文学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对这一历史阶段及其前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作些探讨。

中国社会发展到 19 世纪中叶,与其前阶段很大不同的一点是,出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他们不满足于关起门来自我吹擂、夜郎自大,而是感到有必要并十分需要探首域外,见识“户”外的真实情况,让国人了解世界是怎样的,中国该怎么发展。虽然认识世界这一观念的产生,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始于 19 世纪中叶的清代,但像这一阶段这样,因外来势力汹涌而入,引发一大批海内人士欲了解和介绍域外之情,则是前所未有的,这掀开了中国历史上中外文化与文学关系的新篇章。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诞生了一批探索“夷情”的著作,他们成为近代最早集中介绍和探索世界的先声。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广东查禁鸦片的林则徐,因查禁需要,组织人员搜集、翻译了有关世界舆地及欧美诸国状况的资料,辑成《四洲志》问世,这部著作大致勾画了世界的轮廓,重点介绍了美、法、英、俄等国,为当时闭塞的中国打开了一扇眺望世界的窗口。继之,受林则徐嘱托,魏源在《四洲志》基础上进一步编撰了《海国图志》,将他自己原先研究西北边疆的专长扩充至研究整个世界,旁采“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勾稽贯串”^①,完成了内容上数倍于《四洲志》的百卷本

^① 《海国图志·原叙》。

《海国图志》。《海国图志》一经问世，便显示了它与与众不同之处：其一，以西洋人谈西洋，而非中土人谈西洋；其二，“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尤其后者，成为魏源的一个著名口号，在近代史上响彻神州；其三，内容丰富，包罗甚广，全书包括了舆图 76 幅、志 71 卷，详尽介绍了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及地区的舆地情况，并有《筹海篇》及附录《筹海总论》、《夷情备采》等，总结了鸦片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克敌制胜的政治、军事主张，并配有大量世界史地和西方近代技术资料，是一部中国人自编的、在当时看来堪称极为详备的世界史地参考书，为中国人看世界、了解世界概貌提供了工具。

与《四洲志》、《海国图志》同时及先后问世的，还有姚莹《康轶纪行》、徐继畲《瀛环志略》、梁廷枏《海国四说》等书。姚莹《康轶纪行》是在他被贬官四川，负责处理康藏事务时，乘便就藏人访西事，实地考察而成，其撰书动机来之于鸦片战争的刺激，书中涉及了英、法、俄、印等国史事，并附了中外四海舆地图。姚莹撰写此书，体现了他由鸦片战争失败而痛感中国人有认识外部世界必要的动机。《瀛环志略》是徐继畲在《瀛环考略》基础上的修订补充，全书以图为纲，简要而又准确地介绍了世界各个地区及国家的地理、历史状况。王韬认为，徐氏这部著作与魏源的《海国图志》堪称“各有所长”：前者以简胜，后者以博胜；而徐著“纲举目张，条分缕析，综古今之沿革，详形势之变迁，凡列国之强弱盛衰，治乱理忽，俾于尺幅中，无不朗然如灿照而眉晰，则中丞之书，尤为言核而意赅也”^①。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包括《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兰仑偶说》、《粤道贡国说》四书，书中对耶稣教及英国的历史沿革与舆地等有较详细的叙说。

^① 《瀛环志略·跋》，载《弢园文录外集》卷 9。

可以看出,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以其《海国图志》等著作,为中国人窥探外部世界轮廓,了解域外状况,提供了帮助,这大大拓展了国人的视野,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认识水准,知道“天下”并非仅仅是中国人的“天下”,在中国之外还有更为广阔的世界;同时,凭借这些著作,国人也了解到了世界的状貌及其构成,它们包括地貌、人种、国情、文化等多方面;尤为重要的是,这些著作的问世,促使国人有意无意地会将中国与外国作比较——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从中寻找差距,比较优劣。魏源所说不无道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客观前提无疑是夷有“长技”,我们应“师”其“长技”,从而以制之——这是这批有识之士探索“夷情”的主要目的,尽管这里所说“夷”之“长技”主要是指军事技术,所得出的经验教训也源于鸦片战争的惨败,但从中我们不难悟出,这“师夷长技”实际上可适用于一切方面,尤其是文化方面。

应该看到,林则徐、魏源等人著作的问世,实际上宣告了一个转折时代的开始——长期的闭关锁国的时代即将结束,代之以的是打开国门、引进外来文化,让僵化的、垂死的封建肌体注入新的、外来的活力,以改变昏沉的旧貌,进而焕发出新颜。只是这个转折,在19世纪中叶尚只是开始,林则徐、魏源等人也仅开了风气之先,明显的变革与变化,要在他们之后数十年。

伴随林则徐、魏源等人对世界文化的介绍与引进,继之而生的便是中外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首先是观念上的——表现在近代这一历史阶段,即是所谓“中学”、“西学”之争。简单地说,“中学”即中国传统文化,“西学”即西方文化,其争议的焦点,乃是究竟如何处理两者关系——顽固守旧派是毫无疑问地排斥“西学”,激进派则主张引进与吸收“西学”,但也不排斥“中学”,这所谓的激进派即洋务派。不过,洋务派并非划一,其中既有变“器”不变“道”的洋务官僚,他们坚持中体——中国的传统体制不可侵犯,西用只是为

了更好地捍卫与强化中体，巩固封建统治；同时又有洋务政论家（包括企业家），他们极为推崇西方体制与方式，主张“体”与“用”均变，试图进而根本改变中国传统体制。当然，因为中国社会的特定背景与条件，“中体西用”论终究还是占了上风，它既使中国的传统体制与文化保持了其应有的原状地位，又容忍了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的输入，致使儒家经世致用思想与西方科学实用精神有了结合的可能性，这便产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

“中体西用”论实际上是变革与守旧的调和性产物，但它毕竟适应了当时社会的条件，找到了一条既不从根本上违反传统体制与观念，又能达到适当变革目的的变通途径，它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确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是道、西学是器的原则，它符合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变革的潮流，客观上又不被顽固守旧派找到抗拒与攻击的把柄。这是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社会条件下相对而言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策略。因为，对中学与西学，任何一个极端做法都是难以行通的：绝对排斥西学，维护中学，已为时代所不容许，引进西学的呼声在当时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它是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后的“副产品”）；全盘引进西学，彻底抛弃中学，在中国当时这样一个封建制度沿袭二千年之久的社会，实际上也根本不可能，况且，真的抛弃了中学，引进的西学也失去了依托之地，难以生存。因而，只有“中体西用”才能为中学、西学找到契合的可能点，从而为西学输入中国并在中国传播创造有利条件。

值得指出的是，正是“中体西用”和洋务派的洋务运动，为西方文化的大量输入与介绍、评介提供了有利条件。洋务派为了兴办军事与民用工业，必须首先解决翻译人才，以通过翻译，介绍、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与科学技术，探求西方走向强盛的途径与方法。

于是,创办和设立培养翻译人才的教育机构以与外国人打交道、办交涉,便随着洋务派的实践同时产生了——1862年,北京设立了同文馆,1863年,上海建立了外国语文学馆,称“广方言馆”,亦称“上海同文馆”。1864年,广州也开设了同文馆。这些馆招收学生专门学习英、法、德、俄等西方语言,并在学习外文同时,学习天文、算学等课程。毫无疑问,在设立同文馆等学馆问题上,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产生了争议,争议的核心乃“师夷”与反“师夷”,最终,“师夷”占了上风,同文馆等学馆便予以开设了。这反映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完全关起门来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实际上已行不通,而要使自己强大起来,不受外国欺侮,唯有“师夷长技以制夷”才是上策,这一点,当时稍有头脑的人都已认识到了。

洋务派的主张与实践,不用说,自然只是一种低层次的学习西方运动,它后来走向失败也是必然的,但它毕竟是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基础上的实践与发展,它使得当时的中国人对世界从认识上有了一定提高,不再固守原先传统的封闭立场,正由于此,西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尤其是文化,才得以逐步输入中国,促使中西文化产生冲突与交融,从而开启了19世纪下半叶及其后的中外文化交流。

二

洋务派与“中体西用”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它只能说将原来关闭的大门稍稍开了一条缝,吹进了一点“西风”,而对于整个封闭、守旧的“大院”来说,进来这一点风是远远不够的,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原先闭塞、郁闷的“大院”空气。因此,19世纪末叶产生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所掀起的又一次引进与学习西方的运动,毫无疑问地要抨击与否定洋务运动及“中体西用”论,他们使介绍学习西

方先进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与文化教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主张较之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要激进得多：他们力倡政治变革，主张将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从而根本改变传统的封建专制体制；他们宣扬变法维新主张，竭力介绍并引进西方文化；他们以生物进化论批判传统儒家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论，用天赋人权论批判封建君权论，用自然人性论批判儒学“性三品”说^①，旨在通过变法维新，将落后的封建专制国家变为强盛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家。维新派的主张及其实践，体现了他们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在当时对开拓国人视野起了推进作用。

从引进外来文化角度看，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中以严复贡献最大，他的一系列译作及论文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像一股汹涌澎湃的浪潮，冲击了原本平静死寂的湖面，使之兴起了一阵涟漪。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宣传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法意》，传播了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翻译了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引进了西方科学的方法论^②。他的这一系列翻译、介绍与引进，无疑是想提倡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与社会制度，同时也为维新变法和批判封建旧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思想武器。

相比之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直接翻译、介绍的有关西方文化的论著显然比严复少得多，但康、梁等人将自己接触、了解到的西方文化知识——包括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充分体现在了自己所

① 参见吴廷楨、赵颂尧著《坎坷的历程》第1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② 有关严复的详细评说，见下编第二章，此处仅略述及。

撰写的论著中,这为宣传西方思想与社会制度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以康有为来说,他的学习西方以变法图强的思想,基本贯穿在《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中,其中尤其是《大同书》,乃是他向西方寻求真理、为社会描画改革蓝图的具体表现,书中有关人类大同理想的设想,有关公产言论的阐发,以及有关私有制社会弊端的揭露等,乃是他学习西方、追求世界大同、向往人类美好未来思想的结晶体现,这当中包含了他对西方社会弊端的认识,代表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力求走一条自己独创的新道路的热切愿望。

应该指出,康、梁、谭、严等维新派人士的产生,与时代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大批爱国有识之士,他们从屈辱中奋起,深感变法维新、救亡图存迫在眉睫,而要达此目的,唯有向西方学习,引进资本主义,废除君主专制,才是有效途径、根本办法。因而,戊戌变法便成了这一阶段必然的历史产物。虽然,变法本身由于历史和社会的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它所兴起的学习西方的运动,变革中国旧制度的主张与实践,却无疑是在洋务运动基础上更深层次的拓进与发展,它对中外文化的交流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维新派人士在宣传实践变革维新主张时,对西方文化的引进、介绍和具体运用,从总体上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他们对西方文化思潮及学说的引进介绍,旨在为变革提供思想与理论基础,这当中,尤以进化论、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为主,同时辅之以认识论和逻辑学。这些西方文化思潮和学说,一定程度上既打开了维新派人士自身的眼界,也给国人提供了可参照比较的对象(甚至借鉴、仿效的楷模),它们比起洋务派的那些带有相当保守成分的主张要激进得多,因而学习西方运动的实质

性内容也深入得多。

其二，维新派的主张学习西方和积极介绍西方，范围和领域远较洋务派为广，它们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而不仅仅局限于器物方面，且理论性也强得多，不是仅仅停留于表面形式的仿效而不涉及实质内容，这也比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器变道不变”彻底得多。从某种程度上说，维新派实际上是以西学为武器，抨击和批判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抨击和批判“中体西用”论，竭力主张实行西方式的君主立宪制，从而做到“器变”，“道”亦“变”——进而“全变”、“变本”。

其三，虽然维新派主张变革维新在当时看来具有激进和进步性，然由于它只强调学习西方一面，不看到外国势力入侵中国一面，同时又紧紧依靠了封建君权及儒家思想（满清皇帝与孔子），以之作为变革的支柱，这便导致了它的最终失败^①。

从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宣扬西学，我们可以看出，19世纪下半叶的中外文化关系史，实际上是充满矛盾与斗争的关系史：一方面，有人竭力希图打开国门，引进西方文化，让国人认识中国之外的世界，并将先进的西方文化与中国相比，试图引发中国的变革；另一方面，有人明知西方先进东西的引进已属势不可挡，却又千方百计反对它的输入，顽固恪守传统的旧制度、旧传统，甚至破坏和反击引进者的成果。这种现象的结果，便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一连串的事件与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自然，西方文化被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土地上产生一系列反响，这本身属时代之必然，任何人也违抗不了——这是历史进入到19世纪下半叶，伴随洋枪洋炮轰开中国大门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① 这里还应包括它的不依靠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得不到广大民众支持的因素，以及遭到顽固派与洋务派的联合攻击与反对等因素。

三

应该看到,维新派人士中的部分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开始更多地将心力转注于引进外来文化、文学与思潮,以图推动与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文学的变革,这便掀起了一场以文学(或文化)变革促使政治变革的浪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这是由于戊戌变法失败的严酷教训,使一些维新派人士清楚地看到了寄希望于皇帝的变法图强之路走不通,而要使中国能真正摆脱落后挨打局面,唯有改造国民精神,国民精神改造了,国家才有兴盛希望。由此,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人士,便在文学革命方面掀起了热潮。梁启超本人在1902年创刊的《新民丛报》(第1号)及同年创刊的《新小说》(第一卷第一期)上,分别提出了如下观点:“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英美各国之民,常不待贤君臣而足以致治。”(《新民说》)“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随着他的这一“新民”与“小说界革命”主张的提出,伴之而生的,乃是由他相继提出的“诗界革命”、散文与戏剧革命等口号,以及一批响应他口号者的推波助澜,由此,便形成了20世纪初叶中国文坛上一场风起云涌的文学改革运动,这场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即是以西方欧美(及日本)文学为准则——“吸彼欧美之灵魂,淬我国民之心志”^①，“合中西二文熔为一片”，“以彼新理，助我行文”^②。它使得中外文学关系至此达到了一个高潮，引进、翻译、介绍、评介西方文学的文章、著作可谓盛况空前

① 白薇：《〈十五小豪杰〉序》，引见《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

② 林纾：《洪罕女郎传跋语》，载《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237页。

(其中尤其是翻译)。虽然,此时外来思潮与文学的引入,主要目的在于催醒中国,而显非单纯为了改革中国传统文学的体式,但其客观上却是大大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固有模式与内涵,引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并最终导致产生了新世纪的新文学——20世纪新文学(自然,新文学的真正诞生乃在“五四”及其后,此时的文学革命只能称之为“先声”)。

不过,就维新派人士而言,他们对引进西方文学的态度并不划一——康有为即与梁启超的主张相悖,康氏反对文学革命,认为欧美并非以文学兴国,他主张“物质救国”;严复对梁启超提出的“文界革命”也持反对态度,他主张固守古文雅言,认为“文界革命”不必要也讲不通。从梁启超本人来说,他也毫无疑问地存有偏激与偏颇:如,将文学一味地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以为文学改革了,其它一切都会随之变革;在强调引进与学习外国文学时,忽略或贬低了中国传统文学,更遑论借鉴与继承;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作用等等。

但不管怎样,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叶这半个世纪的巨大历史变革,客观上为文学带来了变化的前提与条件,使之开始了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与外来文学的冲突、交往与融合——无论何派何人,都不会也不可能无视这一客观事实,它为中国文学发展写下了不可或缺的一章,使中国文学史自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本书即拟依凭上述宏阔历史与文化背景,对中国文学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这半个世纪中与外来文学(包括外来文化与思潮)的关系,作较为全面、扼要、系统的阐述,以期把握中国文学在这一历史阶段内的发展脉络与规律,它受外国文学、文化、思潮影响的状况与特点,以及中外文学相互之间的关系等,从而为中国文学发展史添上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章。

目 录

前 言	1
引 论	1

上 编

第一章 翻译文学的兴盛	1
第一节 概述	1
第二节 各体文学之翻译	10
第三节 对翻译本身的探讨	19
第四节 翻译文学兴盛的意义	24
第二章 中西文学的比较	28
第一节 早期的比较	28
第二节 中西诗论与诗歌的比较	31
第三节 中西小说比较	37
第四节 比较的特点与意义	55
第三章 中日文学的影响交流	57
第一节 日文翻译及黄遵宪	57
第二节 文坛革命与日本影响	62
第三节 日本的中国文学翻译与研究	67
第四章 外来文化思潮与世纪初文坛	72
第一节 外来文化思潮的撞击	72
第二节 世纪初文坛概论	79